

主讲人名片

张伯伟 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曾任日本京都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客座教授。著有《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东亚汉籍研究论集》《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域外汉籍研究入门》等；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中国诗学》《朝鲜时代书目丛刊》《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以及英文刊物《东亚文献与文化》等。

好声音

——在今天的韩国，我碰到了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跟我的这一番对话表明，儒学作为东亚地区的一个根，依然存在。

——这之后，汉文化圈开始瓦解，这不是单一的、外来势力挑战的结果，从东亚汉文化圈的内部，我们同样可以找到变化的根据。回到亚洲，回到我们自己的历史脉络里，同样可以看到很多新鲜的风景。

主讲人名片

黄仕忠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近年来，致力于海外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的寻访与研究，在日本各图书馆逐册查阅所藏中国戏曲俗曲文献，积十年之功，撰成《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并与日本学者合编有《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第一辑、第二辑）《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稀见钞本曲本汇刊》等。

好声音

——我们现在认为，小说、戏曲在中国文学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并不是从古以来就是如此的，它的改变和近代学术研究相关，最直接的贡献者便是王国维先生。

——森槐南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自己对中国文学感兴趣，做了大量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带动了一批人，用西方的价值体系来建立中国文学史，在这中间，小说、戏曲就成为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大转向：18世纪中叶的汉文化圈

顾玮 吴央央 整理

汉文化圈的构成要素

汉文化圈的构成有哪些要素？我这里采用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的说法。第一个要素是汉字。为什么？在19世纪末期以前，汉字是东亚通行的文字。

第二个要素是儒学。儒学在今天的东亚社会中仍然保留着。我记得十几年前到韩国参观朝鲜时代儒者的故居，守护这个故居的人姓张，我也姓张。他就问我，我们张姓在历史上谁最伟大？姓张的名人有很多，张仲景、张骞、张飞、张良、张居正，可是这些都不是他的答案。他的答案是张载。张载为什么了不起？他是北宋理学家，讲

过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这是过去的儒者对自己的一个非常高的期许。在今天的韩国，我碰到了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跟我的这一番对话表明，儒学作为东亚地区的一个根，依然还存在。

第三个是佛学。历史上，佛教从中国先传到了朝鲜半岛，然后从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后来，日本直接派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不再经过朝鲜半岛。遣唐使里就有很多的学问僧，僧人到中国来学习佛学，中国也派僧人到日本去，如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法。

关于汉文化圈的概念，各国学者的看法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比如说法国学者汪德迈写过一本书叫《新文化圈》，他说，所谓的汉文化圈主要是汉字，文字非常重要。美国学者狄百瑞认为，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文化代表着东亚所共享的文明，叫东亚文明，但是这个文明又允许通过共享传统的重叠，而坚持其本土的文化，就是说，它有重叠的部分，也有不一样的部分。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文明圈是一个整体，共性多于个性，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文化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当然这个说去是有争议的。



张伯伟 (吴央央 摄)

汉文化圈内部的一次大转向

1763年，朝鲜方面第11次派出通信使到日本去，就是这一次的日本之行，使整个东亚文化圈内部发生了改变。

从1607年到1811年，朝鲜先后向日本派遣了12次通信使。通信使的组成基本上是这样的：首先有三使，正使、副使、从事官，他们的地位比较高。接下去就是会写文章、会写诗的人，叫制述官和三书记，所谓三书记就是正使书记、副使书记、从事官书记。除此之外，还有写字的、画画的、看病的以及军官、翻译等，大概有400多人，去一趟日本约8个月。通信使到日本去干什么？当然有一些外交上的事情，可是最重要的是跟日本“文战”。大家知道，在1592年、1596年，当时日本的丰臣秀吉两次发动侵略朝鲜半岛的战争，后来是明朝的万历皇帝出兵把日本打退了，所以朝鲜王朝对明朝是感恩戴

德的。朝鲜在军事上吃了败仗，朝鲜的通信使到了日本，自然希望在文化上战胜对方，他们是有这个自信也是有这个能力的，因为当时朝鲜的汉文化水平要比日本高。

1763年，通信使到了日本，笔谈、唱和非常多。归国后向国王复命。国王问，表现怎么样？制述官再加上三个书记写得蛮多的，其中制述官就做了1000多首诗。国王又问，有没有把日本人的诗拿来？正使回答说，日本人写的诗没什么可看的。其实，正使讲的是假话，是一句爱面子的话。那一年，他们发现日本的汉文化水平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发现日本有一批青年才俊很厉害，“观贵国人聪明秀敏，此诚文化可兴之日。”“有志者渐趋文翰，比戊辰酬唱颇胜云。”

比较之前几次的经历就可以发现，这种改变是令人吃惊的。1655年通信使到日本，遇到了当时日本汉文化水平最高的人，称为“大学头”（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由林家世袭大学头的位置），他们认为，大学头写诗全无格调。1719年，朝鲜通信使到了日本，备受日本百姓的追捧，一定要他们写字，写完字以后还要盖上图章。可是到了1763年，这一切发生了变化，日本有了一批了不起的青年才俊，这是朝鲜方面对日本的评价。那日本方面对朝鲜是怎么评价呢？1764年，有个叫山根清的日本人说，我这辈子曾经4次遇到朝鲜的通信使，这4次里面也就几个人文章写得好，但也不免有土风，也还是有瑕疵，朝鲜人唯一可取的是写文章很快。你看日本人对朝鲜人的评价是不是也发生改变了？

1763年至1764年，汉文化圈内部的大转向开始了。

朝鲜通信使回国后，苦苦反思，怎么回事，就差了几十年，日本的汉文化水平怎么一下子就得到了提高？他们琢磨后得出一个结论。原来，清朝每年有好多的船到日本长崎去，船上除了载有丝绸这些东西以外，还带了大量的书籍，尤其是新出版的书。这些新出版的书代表了清朝的文化，对日本人影响很大。而反过来，清朝灭明入主中原后，朝鲜以“小中华”自居，认为清朝没有什么可看的文化，什么李光地、顾炎武等人，都是夷敌，他们的东西不足以观，他们的书，朝鲜也不引。

当时中国到日本去的船上所带的书基本上是江南一带的。清朝江南刻书业很发达，这些书刚刚印出来就被带到日本，所以“近者江南书籍，辐辏于长崎，家家读书，人人操觚，夷风渐变。”“长崎之舶，日与中国呼吸相注，天下书籍无不海输山运。”大量的清朝新书运到日本，日本人能很快

加以吸收，所以他们的文明程度迅速提高。

目睹日本文明的进步，朝鲜人觉得不能够再以“蛮”来看待日本，当然也就不能再以“夷”来看待清朝了，新的观念出现了。另一方面，日本人则觉得朝鲜人根本不行，不断贬低他们。连带地，对中国人也骄傲起来，他们开始贬低中国人的诗。白居易的诗在日本平安时代非常受追捧，到了明治时代，日本人讲白居易的诗也不怎么好。

大转向是怎么发生的？转到了什么方向？最后有一个什么结果？朝鲜跟清朝的文化日益接近。日本开始轻视朝鲜进而轻视中国，进而以“东洋之英国”自居，追踪根本在于1763年。

这之后，汉文化圈开始瓦解，这不是单一的、外来势力挑战的结果，从东亚汉文化圈的内部，我们同样可以找到变化的根据。回到亚洲，回到我们自己的历史脉络里，同样可以看到很多新鲜的风景。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国学堂，有删节）

从森槐南到王国维

——中国戏曲研究的兴起与中日学者的相互影响

顾玮 章笑笑 整理

我今天讲的内容是“从森槐南到王国维”，其实我想说的是近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戏曲研究的兴起和日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现在认为，小说、戏曲在中国文学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并不是从古以来就是如此的，它的改变和近代学术研究相关，最直接的贡献者便是王国维先生。我们现在认为，小说、戏曲在中国文学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并不是从古以来就是如此的，它的改变和近代学术研究相关，最直接的贡献者便是王国维先生。

20世纪早期 中国戏曲逐渐登上大雅之堂

人的创获。可以说，这个学科的研究是从他开始的。

那时，日本学术界对中国戏曲的研究也方兴未艾。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盐谷温于1919年出版了《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这本书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尤其对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有直接的影响。盐谷温在序言里讲到，1913年王国维游历京都的

时候，从事了戏曲研究，使得日本的学术界很受刺激。从那以后，狩野直喜、久保天随、铃木豹轩、西村天因、金井君、保三等人，皆致力于中国戏曲的研究，日本学术界呈现了一个万马奔腾的局面，而这个局面的直接影响者就是王国维。

不过，狩野的学生青木正儿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自己的老师才是元曲研究的鼻祖。青木正儿在



黄仕忠 (章笑笑 摄)

1930年写成《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只写到宋代和元代，而王国维结束的地方，就是青木正儿研究的开端。青木的书现在已被翻译成中文，也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必读经典之一。

书籍的流播同时是文化的传播，日本从什么样的角度来接受、影响、反馈中国的戏曲研究？我的工作是从调

查感兴趣的文献开始的，最后涉及的是文化的交流以及文化交互的影响。

在调查中，我发现日本的藏书非常有特色。日本图书馆的藏书基本上和某文库有关，某文库通常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必读经典之一。森槐南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自己对中国文学感兴趣，做了大量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带动了一批人，用西方的价值体系来建立中国文学史，在这中间，小说、戏曲就成为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试用汉文写剧本，有一个剧本叫《补春天传奇》，讲的是关于杭州的故事。他父亲看后很高兴，认为儿子很有出息，把他的文稿拿给当时中国驻日公使黄遵宪看，黄遵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除此之外，1882年的秋天，他还写了一部《深草秋传奇》，发表在《新文诗》上。

森槐南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自己对中国文学感兴趣，做了大量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带动了一批人，用西方的价值体系来建立中国文学史，在这中间，小说、戏曲就成为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森槐南 在日研究中国戏曲“第一人”

收录了他成年以后的诗作。其他的有《古诗平仄论》《唐诗选评释》《杜诗讲义》等，另外还有《词曲概论》，这是第一部词和戏曲的合释，是他在东京帝国大学讲课的讲义。他是第一个把中国戏曲引入大学讲堂的学者，所以他的学生久保天随说：“森槐南博士是明治时代的

词曲研究的开山之祖。”森槐南做了什么样的研究？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的3月14号，森槐南做了中国戏曲的一个演讲，概述了中国戏曲的发展史，两天以后一家报纸报道了他演讲的内容。在那一年的7月，他还发表了《西厢记的读法》，这是连载文章，我现在能找到的只到第77期。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1891年，一下子冒出了一批汉学研究的刊物，可惜这些刊物在日本保存下来非常少。

十五六岁的时候，森槐南还尝

王国维 《宋元戏曲史》是其“博士论文”

中国到底有多少戏曲。所以他先编了一个目录，花了两年多时间，了解中国有多少戏曲剧本名目传承下来。他去调查元曲的曲牌、曲调，他在《宋元戏曲史》里提到，70%的戏曲的曲牌来自词牌，还有一部分来自民间的歌谣，还有一些是唐宋传下来的曲牌。他去考察生、旦、净、末、

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就意味着研究中国戏剧从什么时候开始。最后他的“博士论文”——《宋元戏曲史》差不多完成了，15万字，写了3个月。这部著作的成就远远超越了日本之前做的研究，所以时至今日，《宋元戏曲史》依然是学术经典之一。

其实，学术和文化很多时候是

需要交流的，而交流和影响、互动是双方的，王国维在京都毫无疑问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影响。比如日本学者笛川临风认为，中国戏曲论其词采虽不乏名篇，确实《西厢记》《牡丹亭》都是这样，但是从戏剧作为剧的意义上来看，有些幼稚，尤其是中国戏曲强调的是曲，太注重曲而不注重结构。所以中国戏曲的成熟比较晚，要到宋元之后，大致和这个有关。

而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到，“元曲当中最有悲剧性质的，像关汉卿的《窦娥冤》，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这些剧当中虽

然是因为有些学人在里面挑拨是非，但是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公之意志，所以这样的作品放到世界大悲剧当中也无愧色也。”我以前读这段话总觉得怪怪的，这是什么意思？好像是有人认为它们不配才会说这个话。后来我看了笛川临风的话，才发现原来王国维是针对他们这个说法的。王国维不同意日本学者的看法，但毫无疑问他是看到了日本学者的著作，当然也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影响。所以这个影响是双向的。

（讲演内容来自宁波市图书馆“天一讲堂”，有删节）